

朱著「現代中國改革家張謇」

張朋園

Samuel C. Chu,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: Chang Chien, 1853-1926.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
New York, 1965, 256 pp., with Foreword by C. Martin Wilbur, Bibliography, Index.

一個國家的現代化，包括政治、經濟及文化三方面。政治方面的現代化，以議政或參政基礎的擴大為目標。經濟方面，在於利用日益發達的技術，開發資源，建立工業系統，提高生產和人民生活水準。文化方面則為傳統價值的逐漸改變，代之以新的文化理想。考察中國近百年來的變遷，似亦不出此三方面。清季知識份子之從事中國現代化努力者，無論在官場或在民間，有的着眼於政治的改革，（有激烈與溫和之分）有的從事經濟的建設，有的則銳意於文化的創新。除了在官場者藉政治關係，議論擘劃，有一般性之籌措，在民間甚少有三者兼顧者。有之，則惟南通張謇。其所從事之現代化活動，姑不論成敗如何，對於中國現代化的趨勢，却有着絕對的影響。

關於張謇的研究，國人著作中已有三種，著作人與張謇直接間接都有關係。然這三種著作中，有全面分析者，往往失於不够深入；有深入分析者，難免有方面限制之感。以張孝若的「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」為例。孝若為張謇之子，知父莫若子，全書對於張謇的事業與個性，有生動的敘述，但其論點流於表面，難於滿足讀者深入了解的要求。劉厚生的「張謇傳記」，對於張謇的政治活動有入木三分的刻畫。劉厚生從二十餘歲即追隨張謇，所以對張氏的政治思想與活動範圍有詳細的分析，提供了學者有關張謇政治方面許多極為珍貴的資料與線索。但全書一半以上的政治思想與活動範圍有詳細的分析，提供了學者有關張謇政治方面許多極為珍貴的資料與線索。但全書一半以上所談者是當時的政治局勢，組織鬆散，對於張謇的實業及教育建設，甚少涉及。宋希尚的「張謇的生平」是近年在臺灣唯一關於張氏的著作。名曰傳記，實際上是對「張季子九錄」史料價值的注釋及著者個人對張謇的回憶。有參

考的價值，但不能據以了解張謇的生平。

張謇是提倡中國現代化的人物。前述三種重要著作既不能滿足讀者深入了解張氏的要求，一部有系統的張謇傳記是學術界一直所盼望的。朱昌嶮博士在三年前所發表的「現代中國改革家張謇」，正是大家所引領期望的著作。改革家張謇一書，集前人著作的大成，加上新的研究觀點，條理明晰，達到了後人超越前人著作水準的要求。

朱著全書二百五十六頁，共分九章，起首介紹張謇所處的時代背景，次述張謇的早年生活，而後進入本題，分析張謇所創建的大生紗廠與南通工業。著者又論張謇的政治活動、教育改革、通海犁牧及鹽政改革、導淮計劃及南通的諸種現代化設施，最後以張謇為現代改革家為結論。這是一部組織謹嚴而有條理的著作，著者安排九章的秩序，不僅一一標明了改革家張謇所從事的中國現代化的種種活動，而且在時間上力求先後有序。讀盡全文，頗能獲一對張謇的深刻印象。

朱著第一章的時代背景引論，指出了中國在清季所處的困境，非從事現代化的建設，不足以轉弱為強。但保守與外力的壓迫，使中國不能及時運思於實業建設問題。而張謇却在種種困難之下，獨樹一幟，以個人的力量從事實業教育諸方面的建設，推動政治改革，是中國領導現代化的先驅者。第二章張謇的早年生活，著者扼要地敘述張氏的科第生涯及入吳長慶幕府與在朝鮮的經驗，指出張氏所以在日後不入仕途，與他的歷次科場挫折及深悉中國衰弱有關。他一方面不願為五斗老米而折腰，另一方面認為以在野之身從事實業，對於拯救國家，將更有貢獻。著者又指出，科舉場中的辛酸，雖然使張謇洞悉個人性格之不宜於入官場，但是儒家思想無形中給他的約束，使他不能擺脫傳統，維新觀念進至某一點而止，且永遠為儒術所範圍。

第三章敘述大生紗廠。紗廠是張謇實業建設的開始，也是張氏一生事業的重心所繫。著者敘述大生紗廠建設之

不易，但一旦大生的基礎穩定之後，張氏又設立衛星工廠，南通變成了一個工業區。這是全書最成功的一章。著者以實業家的觀念論張氏之得失成敗。張氏有工業救國的熱情，但並不十分具備現代化工業家的觀念。張氏從事實業建設，未能嚴格劃分民間企業與政府企業的界限，未能瞭解公司組織法中的責任觀念，對待工人，能愛護他們如自己的子弟，但却未曾樹立雙方的契約關係。張謇洞悉工業與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，經濟發展為教育發展的輔助條件，但並無長遠的工業計劃。

雖然如此，著者運用 Joseph Schumpeter 的社會經濟觀念來討論張謇，認為張氏仍不失為一企業家。他有冒險的精神，親身主持一切，克服困難，不辭勞怨，確為傳統中難能可貴的現代化先驅者。著者又用現代化的觀念來分析張謇的工業系統，在傳統中確有獨到之處。著者同情張氏所處傳統社會的不容易，但並非一味稱讚；以現代化的基準看張謇，仍有落後及困於傳統之處。

第四章論張謇的政治活動。著者謂張謇在清末及民初都曾捲入政治的漩渦，但張謇始終沒有全面性的政治興趣，一直置身在政治的邊緣。

第五章論張謇在家鄉南通提倡教育的種種，用比較法看南通教育在張氏領導下的成就。著者分析所得的結論，證明張謇確為一新舊交替時代的教育家。他的重要觀念是全民教育，所以重視師範及小學教育。為配合南通的工業，又發展職業教育。雖然有如此進步的觀念，依然不能擺脫儒家的傳統影響。他的教育思想大部份得自學記，以西洋學制與之配合而已。西洋教育思想對張謇略有影響，但大部份得自日本。張謇主張對學生施以嚴格之管理，男女學生分校。

第六章繫牧計劃與鹽政改革。江北地區之大片土地因受潮汐之終年浸潤，故一般人以為利用海水製鹽最為得宜

，却不知築堤防止海潮之入侵，進而開墾從事農業生產，所獲利益遠較鹽業為大，可養活更多人口。張謇對後者認識最為眞切，因有墾牧計劃，發動地方力量，在南通、海門等沿海區域從事開墾，生產棉花、小麥等作物，頗具成效。關於此點，著者謂開墾事業原非國家力量不易見功，而張謇敢於嘗試，所見確屬遠大。

鹽政改革，看似單純，實極複雜。原因是鹽政積弊已久，根深蒂固。張謇雖有利用新法生產代替舊法之計劃，終無成效。張謇主張以專賣控制鹽務，是否為最善之策，著者頗表懷疑。

第七章導淮計劃。淮水為患由來已久，江蘇、安徽、河南三省常受其害。欲繁榮地方，必須先治淮水，張謇因有導淮之想，惜乎亦未能付諸實現。對於張氏的導淮計劃之是否可行，著者曾引其他四種計劃與之比較。當然，計劃是否週密為一事，有無財力又屬另一事。張謇導淮計劃之未能付諸實施，蓋因政府未予全力支持之故。

第八章南通的現代化。張謇是一個有思想的紳士，欲使國家強盛，因從事實業、教育諸種活動，眼光令人欽佩，但成功不易，一時也難於顯示其影響所在。但大處着眼，小處着手，最能直接惠及地方。張謇在南通所興辦的慈善及公共建設，使南通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都市。張氏的慈善事業，包括孤兒院、養老院、貧民技藝訓練所、診療所、殘廢院、盲啞學校等，純以個人力量推動。公共建設方面，設立了印刷廠、博物館、圖書館、氣象臺、戲院等。著者對此有簡明生動的敘述，讀來有令人置身南通之感。著者同時指出，中國在起步現代化時期，一個傳統紳士能有此種構想，實為難能可貴。

第九章著者引述胡適的話——張謇「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失敗的英雄」——為結論。張謇失敗的原因，有人以為是他的事業沒有適當的繼起者；有人說是因為他的事業過於局限於南通一隅。事實上，正如著者之解釋，張謇的失敗，不能不歸諸於他所處的時代動盪不安，以及張氏個人受儒家思想的限制。張氏不能跳出儒家的約束

，生活的觀念一直未有改變。張謇認識了西方技術的重要性，但未能有西方個人主義、男女平權、追求真理的信念。惟著者仍以同情的語氣說，張謇雖無整套的計劃，但實事求是，如果中國能有更多張謇一類的人物，在地方以個人力量推動現代化建設，則中國的問題，應該在數十年前就已得到了解決。

綜論本書的著述方法，其章節的安排，以時間爲經，以事爲緯，排比得宜，結構上是相當成功的。論著者所引述的材料，亦可說盡到了應有的搜求。著者引證中文史料一百五十種，英文史料及著作七十二種。另外又訪問一些與張謇熟識或對南通有所印象者的意見，用以支持他的論點。或許著者以未能及時得見張謇的柳西草堂日記爲遺憾。但張謇日記的史料價值並不超過張季子九錄或齋翁自訂年譜，對著者的應得評價無所增損。

雖然如此，著者的觀點中，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茲略舉一二如下：著者謂張謇並無全國性的政治興趣，始終在政治的邊緣上活動。大體這是正確的。但張謇的傳統士大夫的責任感，每當國家處在緊要關頭時，並不是畏縮的。張氏嘗謂其一生事業，「莫大於立憲之成毀」。張氏在清季的君主憲政運動中，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。他衷心希望改革有成，勿需經過激烈的革命歷程。現代化的政治運動，並不一定要參加政權組織，或握有實力才謂之參加政治活動。推動時代政治的運動者，往往是那些在野的知識份子。張謇在立憲運動中用力之勤，焦思至再，證明他不是一個旁觀者。又以張謇與辛亥革命的關係爲例。張氏雖然未嘗參加革命陣營，但當他捲入了革命的洪流中時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辛亥武昌起義之後，張謇先是反對，後則轉向贊同共和。他置身於革命黨與袁世凱之間，折衝尊俎，其目的在促使革命黨接受袁世凱的領導地位。直至洪憲時期，張謇始終認爲袁世凱是社會穩定的力量，不惜運用種種方法，鞏固袁氏的大權。凡此種種，我們對於張謇活動的影響，似乎應該加以進一步的估價。（張謇與辛亥革命，目下北京圖書館所保存的張氏函件顯示其有重要的關係。轉見徐嵩，「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」，

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，下冊）。

著者指出張謇受儒家思想的影響，所以未能擺脫傳統的約束力量，這是十分精當的看法。但是著者似乎因爲有所同情於張謇，未能進一步指出張謇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保守性。張謇的時代知識本來有限，復在某些方面困於傳統，若干觀念是有問題的。以導淮計劃爲例。張氏有大禹治水的熱情，但本身並非水利專家，治水計劃勢必仰賴幕僚提供意見。但張氏竟與美國紅十字會派來的導淮技術人員發生觀念上的衝突。固然我們可以將衝突的原因歸諸於美國人員的高傲態度，說他們忽視主持人應有的權力。實際上這恐怕是張謇進步思想中保守成份的作祟。水利專家 John R. Freeman 曾經指出張氏以黃河故道爲淮水出海路線，不能避免淤沙的覆轍，顯見張謇的計劃大有問題。張氏亦承認其所以採用黃河故道，蓋因蘇北擁有鹽田產業者集體反對其他洩洪路線之故，可見張謇不能突破環境的限制與他的保守性有關。

最後，我們亦當指出，本書簡明扼要是其長處，因之亦往往不能暢所欲言，在某種情況下，不能滿足讀者對某一方面進一步了解的要求。例如張氏對南通的現代化設施一節，我們讀了著者的敘述，對南通有一清晰的輪廓：南通的街道整齊，配上五大公園，可以想象它有花園都市的美麗。但是，如果我們以城市化 (urbanization) 的條件來衡量它，南通現代化到了什麼程度？城市化最明顯的現象是人口的大量增加，那麼南通對其左近人口吸引的情況如何？其本身增加的情形如何？這一類的問題著者沒有進一步的敘述。這或許是缺乏資料之故。

如果要進一步指出本書的缺點，那是校對上的一些小毛病。著者在他的注文中所引的史料來源，有若干處我們查對不出原文。第六章的第三、四兩注文即爲例證。注五作 CL (2) VIII 306，實際上應爲 CL (2) IV 306。第七章注二十一也是錯誤的。此外，在人名拼音方面也有互相矛盾之處。例如許鼎霖作 Hsü Ting-lin 是對的，

但在二〇四頁的注文二十一中作Hsü Ting-ling，則兩不相符。再又六十一頁的Liu Shao-nien應作Lin Shao-nien（林紹年），這是校對上的疏忽。好在這些小錯誤在西書中甚為普遍，不是著者一個人的毛病，也不足構成大的影響。總而言之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朱博士的這本書，是研究張謇最成功的著作。